

经学古文派思想而成的，也受过王充哲学思想的影响，但基本上属于客观唯心主义阵营。他相信文德与“天地并生”，“性灵所钟”之人为“天地之心”；相信冥冥中存在着主宰“三才”的“道心”（亦即“神理”），它通过“龙图献体，龟书呈貌”，体现出自己的意志（若“乃河图孕乎八卦，洛书韞乎九畴，玉版金缕之实，丹文绿牒之华，谁其尸之，亦神理而已”。——《原道篇》）。但是“道心惟微，”一定要通过“玄圣”、“素王”的“创典”“述训”，即转化为“文心”，才能施教成化，“民胥以效”。“道沿圣以垂文，圣因文而明道”（《原道篇》）非常概括地表述了这个“道心”通过圣人经典（凝聚为“文心”）得到阐明的过程。至此，我们可以说，所谓“文心”，就是“原道”之心，就是“征圣”、“宗经”之心（因为圣的经体现着道），就是“谘诹六经”之心。“文心”——为文之用心——就要“光采玄圣，炳耀仁孝”（《原道篇》），就要“经纬区宇，弥纶彝宪，发挥事业”（同上）。这样，“文心”就能超脱有涯之生，传之无穷（“百龄俎影，千载心在”。——《征圣篇》）。

刘勰是个文章家，批评家。在“本道”、“师

圣”、“体经”的“文心”基础上，刘勰十分重视文章的藻饰采色。他标举“雕龙”，立志继承“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”的文统，认为孔子“独秀前哲”之处不单在于“谘诹六经”，也在于“雕琢情性”（《原道篇》）；他把“雕龙爽”、“谈天衍”与“惊采绝艳，难与并能”的屈原、宋玉并论。《宗经篇》说“扬子比雕玉以作器，谓五经之含文”，《正纬篇》说“芟夷谲诡，采其雕蔚”，《明诗篇》说“虽各有雕采，而辞趣一揆”，《诠赋篇》说“写物图貌，蔚似雕画”，《诸子篇》说“辩雕万物，智周宇宙”，《体性篇》说“故童子雕琢，必先制雅”，《风骨篇》说“子甲新意，雕画奇辞”，《情采篇》说“雕琢其章，彬彬君子”，《时序篇》说“集雕篆之积才”，《程器篇》说“雕而不器，贞于谁则”，看来刘勰对“雕”字有特殊喜爱，竟在《文心雕龙》五十篇中使用达二十次左右之多。这会不会有“文采雕缛至上”之嫌呢？综观《文心雕龙》，刘勰是在“文心”的基础上言“雕龙”；换言之，“雕龙”是为阐述“文心”服务的。刘勰称“联辞结采，将欲明经”（《情采篇》），其自言昭昭，无须置辩了。

胡风笔名杂录

吴晓明

胡风，原名张光人，又叫张光莹，小名谷儿。1902年生于湖北蕲春县。有的资料说胡风本名为张谷作，这是错误的。据1972年5月21日胡风亲笔写的《简历》，有“原名：张光人”句。1979年10月初，胡风在应《中国文学家辞典》的征求而写的一篇简历材料上，也写道：“胡风，湖北蕲春人。本名张光人。笔名还有谷非、高荒等。做职业翻译时用过张果。1902年生。”胡风口述的《关于‘左联’及与鲁迅关系的若干回忆》（《鲁迅研究动态》1981年1月25日，第一期）中，他自述用过“风”、“果”、“霏”等笔名。

除上述几个外，胡风其他的笔名还有一些。

“谷音”，胡风大革命失败后退走到武汉，他曾和湖北所谓的国民党左派——改组派的头头邓的民有过关系，但随即离去。政治上陷入了一个苦闷时

时期。“谷音”这个笔名便是“1927年在湖北《武汉评论》上写反动文章时用的（共三篇）”（《简历》），

“张古因”、“古因”。胡风1927年离开清华大学英文系，回家乡参加革命后，“受过一些波折。经过迷误（《胡风语》）他先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任干事，而后“1927年约12月间，在国民党第三十一军政部（南昌）任中校宣传科长，历时一个月差两三天，离职。当时改名张古因”（《简历》）。“古因”便是他这段时期所用的笔名。这个笔名是胡风1927年底到1928年初在南昌的《野火》、《长天》和《第三周刊》上写文章时用的。1930年“文总”的机关刊物《巴尔底山》和“左联”的机关刊物《世界文化》上曾有署名“谷荫”的文章。这个“谷荫”有说询“古因”、“谷音”的谐音。1981年，笔者曾去信系问胡风先生的女儿张晓岚，她答复我说：“‘谷音’

和在其他刊物上著名的“何封”等几个笔名，（胡风）“都没有用过”，不是我父亲（胡风）的文章。”

“K, J”。这个外语字母笔名是胡风1927—1928年在湖北《武汉评论》上发表诗作《儿时的湖山》时用的。这首诗写于1925年，后来收入胡风的诗集《野花与剑》中。

“中川三郎”、“中村获”、“中川获”。胡风1929年秋到东京，虽然进了庆应大学英文系求学，但主要精力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和普罗文学运动的学习和革命活动。他参加了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新艺术学研究会，与日本普罗作家江口涣、小林多喜二等普罗作家过从甚密。在普罗刊物《艺术学研究》和《普罗文学讲座》上向日本人民介绍过中国文学的情况。胡风当时在“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新艺术学研究会”里用的是“中川三郎”名字，在该会出的《艺术学研究》季刊上发表的文章，用的是“中村获”、“中川获”等名字，

“张谷非”、“谷非”。是胡风到日本后所用的中文笔名。日本出版的《中国学芸大事典》和《现代中国人名辞典》认为“张谷非”是胡风的本名。这与事实不符。据胡风自己讲：“1934年初……开始了职业作家的生活。这以前，在东京时已用‘谷非’笔名译过苏联初期革命浪漫主义故事《洋鬼》，还用这个笔名写了一些评论，如挣脱不了机械论影响的《论主题积极人性》和对第三种批判等”（《简历》）。

“胡风”，①这个笔名大约是从1933年下半年起开始用的。对于这个笔名，胡风自叙为：“我小时候家里很穷，父亲是磨豆腐的，母亲是童养媳。我后来用胡风这个笔名，就是因为我母亲姓胡”。（《关于‘左联’及与鲁迅关系的若干回忆》，与胡风谈话笔录）1933年7月，在后来收进《棘源草》（杂文集）的《作家与草莓》一文，是笔者所见最早用的“胡风”这一笔名发表的文章。“抗战起，为使用方便，以胡风为本名用”（《简历》）香港出版的《中国现代六百作家小传》中说：“到1927年他（胡风）离开清华大学之时，他已用‘胡风’笔名写稿，投向各文艺刊物上去发表。因此，他俨然已厕身于作家林之了”。这段文字所述的“胡风”笔名用起时间，与实际情况相对照出入较大。特别是与胡风自述的几个笔名的次序“先用谷非，后用胡风，偶用高荒”（1972年5月21日，亲笔材料）相比较出入更大，而“谷非”这一笔名是胡风到了东京后才用的。据此可见，“胡风”这一笔名起用于1927年之说，显然是有误的。

“张果”、“果”。1933年春，胡风因在留学

生中组织左翼联盟被捕。7月初（一说8月）被驱逐回上海，即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宣传部长，数月后改任书记。1933年秋到1934年秋，在国民党孙科派主持的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刊物《时事类编》做职业翻译。这段时期，他用的是“张果”、“果”的笔名。在1933年8月10日到1935年初的该刊上，胡风发表了许多政论性摘译。用此笔名载于该刊的文章，最末一篇是《历史上主观条件的意义》一文（三卷三期，1935年2月10日），该文在预告时称是“张果”译，发刊时改由王明斋译。其原因是胡风因被人指摘为“又吃国民党的饭，又吃共产党的饭”而辞职离去。1935年底，由胡风主持创办了有鲁迅指导的杂志《海燕》。在《海燕》上胡风每每用“果”的笔名发稿，如1936年1月20日第一期上的译稿《文艺底课题》（高尔基著）一文。

“顾纷”。胡风说“在1934年冬初，因穆木天自首后造谣，在政治责任感上愤而离职”（原文如此。“职”指“左联”书记一职）。其后，在上海《中华日报》付刊《动向》上讨论关于旧形式的利用问题时，胡风使用了“顾纷”这一笔名。

“谷”，是“谷音”、“谷非”的省略。最早见于生活书店发行的由文学社主编的《文学》（半月刊）第二卷第二号上（1934年2月1日），题为《学者与文人》。

“谷风”，大约是“谷音”、“胡风”这类笔名的合璧吧。初见于文学社编辑的《文学》（月刊）第二卷第五号上的译作：《黑的花环》（黑人诗选）。其时是1934年5月1日。胡风自己讲“谷风”这一笔名，是“和欧阳山合译《野性的呼声》时用的”（《简历》）。该书于1935年2月由商务出版。

“风”，系“胡风”、“谷风”之略称。初见于文学社编的《文学》（月刊）第三卷第一号上，题为《再论文学遗产》（1934年7月1日），以后在该刊上，胡风用“风”署名其译文者多篇。

“霏”，是取音于“张谷非”、“谷非”的“非”字。据胡风自己讲，1935年后，在由他主持创办《海燕》上，胡风多次用“风”、“霏”、“果”的笔名。“霏”这一笔名最早见于1936年1月20日，《海燕》第一期的小翻译文字《非常时的心境》（日本志贺直哉著）

“高荒”、“马荒”。这两个笔名所见无多。前者首见于1936年9月20日《从血恨的纪念里成长罢！》

① 茅盾在《关于乡土文学》一文提到，在胡风为《生死场》写的后记末，胡风署名为“胡非”。

(刊《中流》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上)。后者则见于1937年3月生活知识社编的《弱小民族小说选》中收的《山灵》一文。初发表时用“马荒”这一笔名。该文于1951年重版时,改用“胡风”这一笔名,“马荒”这个笔名,仅见此一处。

另外,鲁迅先生1934年1月18日到1936年10月17日的日记中,提到胡风时的称谓还有“光乍”、“古斐”、“古飞”、“光人”、“张因”(“因”字由“果”字而来)等,据张晓岚同志告诉笔者,胡风未用这些名字发表过文章。

一八六〇年上海人民 三次武装起义

于醒民

1860年,为响应太平军进军上海,沪城内外的农民、士兵、市民多次举行武装起义,其中有三次规模甚大。

严炳起义 严炳,上海县浦东塘桥人(一说严桥人),1852年参加过小刀会起义,隶潘起亮。后起义失败,他原可和潘起亮一样,远离上海去投奔太平军,但他自愿潜伏不走,以浦东塘桥镇为中心,秘密联络小刀会起义军余部及四郊的反清农民、渔民、盐民群众。经其长达五年多的艰危努力,到1860年五月下旬,起义的准备工作已臻最后阶段:1.各处起义人员共达数千名。2.分布在上海县及附近各县,以上海、南汇、奉贤、宝山四县最多,以江湾镇与杜家巷镇为预定的集结地点。3.起义所必需的大量文告、旗号、服饰、军械等业已缮写、缝制、打造就绪。4.与太平军方面建立了必要的书信联系,可惜,这一联系不够经常与有效。该年五月二十八日,太平军攻克常州的消息传到上海,各处起义人员纷纷赶往塘桥镇请示。官府生疑后捕捉四人,得悉其情,吓得知县刘郁膏当晚带重兵包围该镇,大肆搜捕,并连夜开刀杀人。严炳、周连生、张二等起义领导人就义。其时,署上海道吴煦在通缉起

义“余众”的公文中说:“查严炳本系著名地棍,三年秋间,又与上海城匪潘小镜子同恶相济,久已漏网,近复暗通粤逆,啸聚多人……”,惊呼“又一周立春也!”

余义政起义 余义政,广西人,清军下级军官,有兰翎守备加都司之街,1860年春夏在上海联络三千余名清军士兵,(占全城清军四分之三以上)准备起义。余义政将起义的时间定在太平军进军上海城之日,届时由起义士兵打开城门。余义政的指挥部设在船上,机动性大并不易被发现。但事机不密,巡抚薛焕下令禁止两广籍(起义士兵以两广籍为多)携带武器;华尔洋枪队七月十六日偷袭松江得逞,又抢到太平军接应此次起义的机密文书。于是,清方不借付出重金将有嫌疑的士兵火速“资遣回籍”。余义政不幸于八月十日被捕,“即时正法”临刑前抱恨终天而“别无他言”。

市民起义 该年八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时许,太平军进军到上海城西门前,“大、小东门即有头扎红布,手执黄旗、刀械者”三、四百人举行暴动,控制里、外洋行街地区。暴动市民均“身有白图兰字腰牌为记”,领导者为“手执大旗”的市民郭阿炭。因太平军始终在西门外与南门之间受阻于英法联军,未能前来会合;英法联军对起义地区狂轰滥射,且出动兵员在该处纵火,起义市民被迫撤出战斗。当天夜里,起义市民再次在大、小东门外江海南关附近的烂泥渡。(今杨家渡)暴动,参加者数千,很快控制了海关,等待已进至小南门外东南的太平军与一支木船队前来会合。可是,后者又遭英法联军的拦击、火攻,起义市民再次撤退,海关起火。八月十九日上午,起义市民第三次在大、小东门外浴血战斗,外籍志愿人员数名参加行动。但太平军仍然未及时赶到,英法联军第三次对该地狂轰滥射,所纵之火更大,将该地大部分建筑物烧成瓦砾。起义遂告失败。显而易见,连续两天一夜的上海市民起义声势大、斗志旺盛,及时响应了太平军,在战术和策略上也相当出色。起义者锲而不舍地坚持在大、小东门外战斗。那里当时是上海主要的商业区和中外货物流通枢纽,控制该地对攻克上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。